

# “大历史观”视域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成

任晓伟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从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大历史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始终流淌着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鲜明彰显着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真理力量，深刻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高度创新了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类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4-001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sup>[1]</sup>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在“大历史观”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需要不断站在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高度去反思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牢牢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历史自信，从而沿着历史前进的逻辑不断前进，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新征程中创造更大辉煌。

## 一、始终流淌着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至今，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已存在和发展了500多年了。这500多年是社会主义从思想不断向实践转变、新的实践又不断推进人类发展的

500多年，也是一代代、一批批进步的仁人志士们不断追求人类解放、真正的正义和美好生活的500多年。从“大历史观”来看，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在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上占了300多年时间，对后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世界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上都有关于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想像。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对一个以城邦国家为载体的基于正义的幸福国家的想像。柏拉图说：“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sup>[2]</sup>这样一个正义和幸福的国家，只有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sup>[3]</sup>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也是

对美好生活的想像。《礼记·礼运》中详细地描绘了这个社会的景象，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4]</sup>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西方到东方的先哲们都曾经幻想过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美好社会。但是，诸如这一类的想像只能说是空想，还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从16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形成的批判资本主义、替代性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和主张。根据《资本论》的科学结论，真正的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开始的。

从16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人类步入了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随之发展。在16-17世纪产生了第一代以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莫尔写了《乌托邦》，康帕内拉写了《太阳城》。在这些著作中，他们细致地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综合来看，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有计划地统一安排社会生产与生活，采取按需公平分配原则，消灭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和脑体对立；民主选举产生社区领导人和最高领导人，不称职的可以随时被撤换；依法治理社会，人人知法、人人守法，重罪处以终身奴隶般的苦役，但是主张废除死刑，以示人道主义；实行免费教育与医疗，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们酷爱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和一切暴政，主动无私帮助邻邦建设理想社会。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这时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很多重要观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经有了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进步认识。比如莫尔就写到：“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sup>[5]</sup>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无疑对后

续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极大的启发和影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大多以文学幻想的方式呈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残留着保留像奴隶制这样的不彻底因素，有他们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

与第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进入18世纪后，以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温斯坦莱为代表的第二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超越了文学批判的形式，走向了以“法”的形式来批判资本主义和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阶段。他们写了许多著作，比如《自然法典》《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他们讲的法，即所谓的“自然法”，是指支配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外部规律。他们依据“自然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只有政治平等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符合自然法的社会才是美好的社会。在第二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中间，巴贝夫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巴贝夫在1797年的《平等者宣言》里说：“我们今后主张，我们出生时是平等的，活着和死时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真正的平等，否则毋宁死。我们为了得到这种真正的平等，让阻拦我们的一切见鬼去吧……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另一次更大更隆重革命的先导，而这种革命是最后的革命。”还说：“让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小人物，评价和仆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让这些令人恼怒的区别消亡。”<sup>[6]</sup>巴贝夫关于人民革命、人民专政和平等共和国的论述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巴贝夫的理论贡献，把巴贝夫的著作看作是“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sup>[7]</sup>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产生于19世纪初的以傅里叶、圣西门、欧文为代表的第三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则更前进了一步，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也更细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着直接的现实批判。比如，他们提出，资产阶级占有政权只是产生了新的政治奴役形式，资产阶级自由是“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sup>[8]</sup>这已经包含着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还认识到生产性过剩危机源于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恢复了的奴隶制，是反对大众的个人所有制的暴政，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建立

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受自身内部的力量支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由低到高，受上升的和下降的两种力量的支配，资本主义是封建制度和未来制度的“过渡”。历史发展的任务，不再是改善资产阶级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sup>[9]</sup>这无疑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非常细致地描绘了消灭了级界、种界、国界、形界、家界、类界以及消灭私有制、国家和家庭之后的美好社会，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优秀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之一。这一著作尽管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但也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sup>[10]</sup>的岁月里，鲜明显示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抗争和不屈服以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变革精神。

总体上说，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不成熟的阶级的不成熟的理论，有极大局限性，主要依赖幻想批判资本主义，“解释”完世界但找不到“改变”世界的道路，在理论上想代表人民群众但在实践中鄙视人民群众，忽视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无产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所蕴含的历史使命。但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sup>[11]</sup>马克思所说的这种“萌芽”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空想社会主义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反抗，对真正的人性、人道和社会平等的诉求，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计；二是空想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资本私有制，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彼此关爱、人人劳动、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按照需要进行分配的理想社会；三是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展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或正义的力量，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是社会主义本质性内涵的重要内容。后来，马克思主义虽然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力量，但这并没有改变空想社会主义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逻辑，这就使包含在空想社会主义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继续流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中。

## 二、鲜明彰显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真理力量

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基础上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空想社会主义必然要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以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也即科学社会主义正式问世。这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所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发展及其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在道德、人性、正义方面的内涵，只是赋予了它新的科学的思想逻辑、新的强大的组织逻辑和新的革命的实践逻辑，把美好社会的憧憬建立在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对美好生活斗争的规律性认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sup>[12]</sup>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理论发现”成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基础。从这“两大理论发现”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彻底的科学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具体阶段，并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不是正义、公正的制度，同样是建立在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新的压迫条件代替了旧的压迫条件；企求统治者是无法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无

产阶级必须要在政治上行动起来，才能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解决了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法解决的难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现实基础和阶级力量，为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和历史路径。

推动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做出的最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sup>[13]</sup>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来说，不能认为他们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判断都是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也经常对过去的观点进行修改。比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序言中他们就提到：“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sup>[14]</sup>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及其所阐述的重大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社会历史的阶级分析方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设想；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和两种分配方式的观点；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等观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它的基本立场上。基本立场是在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有鲜明价值性的趋向，在根本上解决的是理论为谁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是科学性和道德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其有力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sup>[15]</sup>习近平总书

记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sup>[16]</sup>这些重要论述科学指明了基于科学性与道德性统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力量。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思想和组织水平。经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1864年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89年创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的领导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实践和组织上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工人阶级作为强大政治力量的发展面貌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化，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中的科学性和强大价值引领性。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以伟大的发展成就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sup>[17]</sup>这一论断的科学性，鲜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 三、深刻汲取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历史教训

在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界标，标志着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后，又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对后来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

十月革命是人类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时代条件和俄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必然要产生的历史结果。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农村中3000万农民生活贫困，1700多万城市工人生活低下；贵族地主获得大量利益，出售了（到1905年）6.5亿卢布的土地，但从国家补贴中拿

到9亿,从农民交纳的土地赎金中拿到20亿。同时,俄国长期扩军备战,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牺牲和负担。1914年,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强了扩军备战,建起了陆军大约190万,合计170个师,还有预备兵源560万人,这使俄国农村劳动力丧失了47%。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战死310万,使国内外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也使推翻沙皇专政主义政权的社会革命的发生不可避免。<sup>[18]</sup>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sup>[19]</sup>这其实也表明,十月革命是人民被压迫得无以喘息时不得不奋斗探索新道路和新文明的历史创举。因此,必须要把十月革命的发生与后来探索的失败划分开来,决不能因为后来苏联把社会主义搞失败了,就回过头去说十月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后,在74年的实践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尽管取得了不少历史成就,也彰显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由于历史和理论的局限,苏联社会主义最终以失败结束,苏联共产党也在丧失了执政地位后宣告解散。从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算起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也走完了自己93年的历史。如何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课题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新实践新探索不断发展常思常新的重大历史课题。

从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来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苏联在多次的模式转化中没有走上科学的发展道路。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转化,应该说是苏联74年历史上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但是,遗憾的是,在多次模式和道路的转化中苏联没能开辟出一条与本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史,第一个模式和道路是1917—1921年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是以余粮收集制(口粮,后来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体制,包括集体化、全盘工业化、按阶级标准进行分配以及指令性的行政计划体制等。这种模式和道路的形成,虽然对于十月革命后战胜外国的武装干涉、维护革命的成果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激起了农民和工人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是“一种错误”,“我们做的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sup>[20]</sup>从这开始,苏俄开始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第二个模式和道路是新经济政策。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和战时共产主义弊端的呈现,以1921年俄共(布)十大的召开为标志,俄国开始走上了“改革”道路,逐渐形成了以粮食税、缩小和改革国有制、发展私营经济、对外开放、发展租让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具有鲜明市场化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探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俄国迅速恢复战争创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列宁1924年去世后,由于受复杂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加上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制约,新经济政策没有能够沿着它本身的逻辑不断深化和发展下去,新的实践之树的力量没有能够在当时战胜灰色的理论而被迫中止了。第三个模式和道路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1928年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后推动了党和国家开始重新沿着集权化和集中化的道路发展,在强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重大成就,在当时的标准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欧洲第一大工业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稳定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方面,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建构起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有制)和强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形成了以领袖个人专断、以党代政、领导职务终身制、广泛的干部任制、缺少党内民主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简单化后形成了刚性的意识形态和封闭性的思想文

化环境，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客观地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苏联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很多弊端，成为束缚经济社会发展和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障碍。第四个模式和道路是“改革性”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斯大林去世后，为了消除经济、政治体制中的弊病，苏联再次走上社会主义改革，试图在改革中推动发展。但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他们大都是只进行点滴经济政策的调整，比如农业政策的调整，强调市场作用的调节作用，以利润来刺激国有企业生产，在强调和平的时代特征基础上推动与世界的交流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改革力度太小，也缺少顶层设计，缺少改革的整体性战略，忽视甚至否定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始终没有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原有体制的弊病和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改革的方向和性质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我们设想的革新后的苏共是一个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的党。”“苏共将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为在民主进程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奋斗。”<sup>[21]</sup>随后召开的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布：苏共是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党，当前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说明苏共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严重问题，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为回归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纵观起来看，苏联虽然有过四次模式和道路的变化，但最终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没有走上一条正确的、健康的发展道路。

二是在苏联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没有彰显出来。由于长期反对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断积累，苏联的生产力水平不断下降。尽管一些时期也出台过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党内形不成统一的改革共识和一些改革措施的不彻底性，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效益

不佳和生产力发展缓慢的趋势。在政治方面，则长期延续高度集权的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严重缺失、治国理政能力不断下降。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导致党和国家的思想严重僵化，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没有形成适应时代和人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创新。

三是苏共最终不能够保持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共产党的性质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22]</sup>“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sup>[23]</sup>然而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共逐渐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他们可以享受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殊医疗服务，拥有宽敞的住房、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他们掌握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裙带盛行，成为维护传统的旧体制和抵制改革创新的主要力量，最终使苏共丧失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只能落得个亡党亡国的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24]</sup>这是一个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深刻结论。

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使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失败的是一种不成功的历史探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sup>[25]</sup>从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可以得出几点基本结论：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和命令主义方式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是走不通的，死路一条；不发展生产力和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要继续前进，必须要探索出新的发展道

路；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问题，在于把党建设好，守好人心，把党和人民这对命运共同体不断地建设好、巩固好和发展好。站在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就是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再次走在时代前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26]</sup>这也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中流砥柱的历史方位。

#### 四、高度创新社会主义 500 多年的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后，在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探索和积累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探索所形成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统一体，是基于改革、开放、创新、共享、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又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文化特色和实践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一个“世界所少见”到两个“世所罕见”的转变。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sup>[27]</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sup>[28]</sup>这一伟大转变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500 多年历史经验的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智慧。在领导人民群众百年历史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实践为中心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大成果，使党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党的十八大后，在领导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飞跃，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说：“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sup>[29]</sup>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原创性地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原创性地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在深化对矛盾运动具体性认识的同时形成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创性地发展成为系统的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创性地转化党员干部的科学的辩证思维能力。<sup>[30]</sup>这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有了强大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创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提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观点新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进到新水平新境界。比如，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不断创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使党的中心工作紧扣人民群众的发展愿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起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了在

改革过程中协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要建设全过程民主和高度法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上，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体，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等。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既对创新性实践进行了科学的理论反映，又对实践的新发展持续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三是源于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民族使命和人类担当。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结果，这在客观上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情怀，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近100年的持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历史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开始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坚持“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sup>[31]</sup>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创新性历史实践不断深化对人类解放的认识和实践，使得为人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强烈渴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sup>[32]</sup>在思考和回答这一时代之问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向世界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愿景和主张，鲜明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彰显了中国的人类担当。

四是源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和通过党的自我革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能力。把党建设好，是中国事业的关键。党的自我革命，是把党建设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

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sup>[33]</sup>党的自我革命能力，就是捍卫自己初心和使命的能力，捍卫自己宗旨和性质的能力，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的能力，是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方面与一切和党的性质不相容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能力。以自我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一重大论断，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指导着新时代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国家、民族、军队、人民的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面向人类发展贡献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和发展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34]</sup>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人类新的文明发展方式，使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也使社会主义的时代吸引力越来越强烈。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大历史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从思想到运动、从运动到革命、从理论到实践，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面貌和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从社会主义500多年的整体性来看，虽然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写16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规律。在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模式占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一模式最终的失败，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但辩证地看，这也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和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苏联模式和探

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和民族复兴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性成就和世界性影响，鲜明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sup>[35]</sup>由此来看，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回到历史，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远眺前行的路。在对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回顾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将不断增强对自己正在走的历史必由之路的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10][17][24][26][3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2][3][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33, 251.
- [4] 李伯钦编. 四书五经(第5册)[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466.
- [5][英] 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43, 44.
- [6][法] 让·马雷, [法] 阿兰·乌鲁. 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7, 18.
- [7][14][22][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30, 377, 411, 413.
- [8][9] 傅立叶选集(第3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53, 102.
- [11][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23, 265.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1003.
- [13][16]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 8.
- [18] 陆南泉等. 苏联兴亡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83, 102-104.
- [19][20]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77, 450.
- [21] 苏联问题资料[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0: 25.
-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83.
-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31.
- [2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9.
- [29]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 2019, (1).
- [30] 任晓伟.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进程中的重大原创性贡献[J]. 广西大学学报, 2021, (2).
- [31]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7.
- [32] 习近平. 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20-11-11.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30.
- [3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 人民日报, 2017-09-30.

作者：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钟晓媚